

※研究動態※

嶽麓書院學術的傳承和發展

殷 慧*

嶽麓書院自北宋開寶九年建立以來，學術綿延，弦歌不絕，一直是中國學術、思想與文化的重鎮，享有「千年學府」的美譽。嶽麓書院的發展過程不僅見證、反映了中國學術文化發生的一系列重大變革，而且在這些重大變革中，承擔起中華學術文化傳承、創新的歷史使命，因而在中國文化、學術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唐宋之際，中國文化發生了重大的演進。繼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之後，兩宋時期興起了理學文化思潮。理學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思潮，其主要特點在於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綜合。它以復興先秦儒學為旗幟，力圖使儒家文化在新的歷史時期得以振興，要求重新解釋儒家經典，大量汲取、綜合了佛、道兩家的宇宙哲學和思辨方法，將其融合、補充到儒家學說中去，使儒學有了精緻的哲理體系。自宋以降，理學已經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後期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文化，理學的形成本身也是中國思想文化向更高層次綜合發展的體現。如果說漢代儒學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國家意識形態，它首先通過國家的學術中心和教育中心——太學來研究和傳播儒學；那麼，宋代復興儒學的思潮則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學術文化思潮，宋學最初主要是通過地方的書院來開展學術研究與傳播。一批批立志於倡揚儒家價值信仰、重建儒學知識體系的新儒家學者聚集於各個地域的不同書院中，潛心著述、授徒講學，於是，一個個具有各自學術傳統、思想特色的地域學派就形成了。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嶽麓書院開始成為新興理學思潮的大本營。當時學術界最有影響的著名理學家紛紛講學於此。南宋乾道年間，被稱為「東南三賢」之一的張栻主持嶽麓書院講席，在此聚集了一大批理學之士，形成了當時學界很有影響的「湖湘學派」。張栻沿著胡宏由人道而及天道的途徑，通過探討性命、道器、理

* 殷 慧，湖南大學嶽麓書院講師。

氣、太極等一系列範疇，全面系統地論證了以人倫為本位的本體論哲學，提出了「太極即性」的理論，主張「純粹至善」的絕對性善論，推崇「知行互發」的認識論。張栻的理學思想在當時明顯體現出兼收並蓄的特色：張栻以太極為本體，和朱熹等人一樣是理本論者；當他以「心」為主宰者、為本體，和陸九淵的心本論又十分接近；當他主張道器一體、太極和萬物不分、天地間惟萬物時，又和張載一派的氣本論觀點有相同點。張栻於嶽麓書院研究學術，進一步開拓、深化了湖湘學派的學術思想。他使得湖湘學派的理學思想體系更加完善，理學範疇更加豐富，理學命題更加精密。

同時，後來被稱為「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著名理學家朱熹兩度在嶽麓書院講學傳道，更是形成了學術鼎盛、文化繁榮的歷史局面。其中最負盛名的應該是乾道三年(1167)的朱、張會講，當時朱熹欽慕張栻得衡山胡宏之學，「往從而問焉」。據史料記載，此次張栻與朱熹的會講，主要討論了《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朱熹也自述：「生平於書無所不讀，於義理無所不究極，而其綱領樞要，則在《中庸》『未發』一語，先後與張栻論之最詳。」朱熹正是在與張栻志同道合、講磨辯難中，實現了從中和舊說到中和新說的演進，從而達到了共悉儒學之源流，而「一歸於正大」的學術境界。另外，朱熹還與張栻及其弟子討論了胡宏的《知言》，這為後來朱熹編著《知言疑義》奠定了基礎，也成為朱熹學習、吸收並超越湖湘學派的重要思想材料。朱、張會講使嶽麓書院的聲名為之一振，當時四方學者雲集，生徒逾千人。嶽麓書院已經成為宋代學術文化史上最著名的理學思想討論與傳播的基地之一。

以後，許多知名理學家紛紛來此講學。南宋後期，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知潭州，任職期間，對嶽麓辦學及傳播理學，表現了極大的熱忱。他曾親往嶽麓，主持書院的祭典，推崇有功於書院的歷史人物。他曾作〈勸學文〉，高度讚揚湖湘理學學術之盛，極力宣揚朱、張之學以培育人才。《嶽麓志》稱其「尤樂育人才，以周、程、朱、張之學勸勉士子。是時講學雖廢，而教化大行」。宋元之際，嶽麓諸儒參加抗元鬥爭，嶽麓書院也在戰火中化為廢墟。元代延祐元年，書院得以重修。據吳澄所撰〈重建嶽麓書院記〉和〈百泉軒記〉，元代書院的教學體制恢復後，由朱熹、張栻所奠定的文化教育傳統也得以繼承和發揚。明代中葉以後，理學思潮中的心學一派王陽明及其弟子亦紛紛來嶽麓書院講學，嶽麓書院成為新興的心學思想的傳播基地。據《嶽麓志》記載，王陽明「寓居嶽麓，為朋徒斤斤講良知之學，是時

朱、張遺跡久湮，賴公過化，有志之士復多興起焉」。後來王門弟子季本、羅洪先、張元忬、鄒元標等先後講學嶽麓，力守王門正宗，對「倡狂自咨」的王學末流深為不滿。在良知之學一度成為嶽麓自由講學的中心議題的同時，朱、張理學傳統仍然受到尊重，並保持一定的影響。明末嶽麓書院以高世泰和吳道行為代表的學者倡傳東林之學，提倡治國平天下的有用之學，以能否治事作為衡量思想學說的標準，並極力維護程、朱理學。嶽麓書院在明代始終沒有那種浮誕不逞、空談良知之習，而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重踐履、務實學的傳統，這與嶽麓書院在學術上堅持理學與心學並重的基礎上，推崇程、朱理學，有很大的關係。總之，在中國學術文化發生重大變革的宋明時期，理學成為這個歷史時期最有學術創新力的文化思潮，而嶽麓書院一直是這段時期內的理學思潮重鎮，在民族文化的更新發展中，發揮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明清之際是中國早期啟蒙思潮產生的階段，嶽麓書院培養的學生王船山就是這個階段的代表人物。一方面，他是湖湘理學的繼承者，承傳了兩宋形成的理學文化，並對理學作了全面系統的總結和批判，其思想體系包容了博大精深的理學思想體系；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國學術文化的轉型者，他以「六經責我開生面」的文化使命感，在政治思想、倫理道德、哲學觀念、人格精神等各個領域均有新的開拓。在哲學上，他繼承了王充、張載的思想傳統，完善了元氣本體論，主張「天下惟器」的唯物觀。在倫理觀上，他反對「存天理，滅人欲」的理欲對立論，主張「離欲而別無理」的自然人性論，富有獨創性地提出「性日生日成」的人性思想，肯定了人性是在社會環境中生成的。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反對君主專制，認為「天下非一姓之私」，土地非帝王私產，應歸耕者所有。還有，他批判歷史循環論和復古論、推崇豪傑人格等思想，均代表著那個時代的精神，具有濃厚的啟蒙色彩。

清代嶽麓書院為朝廷官府控制，課試八股時文成為當時的主要教學內容。同時由於嶽麓書院是著名理學基地之一，康熙賜「學達性天」匾，乾隆賜「道南正脈」額，朱、張之學仍被視為嶽麓書院的主要學術傳統。清中葉以後，受乾嘉學派的影響，一些從事詁經考史的經學家主持書院，他們在嶽麓書院研究和傳播經學，並取得了一定的學術成果。如經學家王文清主院，強調「通曉時務物理」和詁經考史的務實學風。道光年間，巡撫吳榮光在嶽麓書院創辦湘水校經堂，進一步推動了漢學的發展。

鴉片戰爭後，嶽麓書院所培養的學生中，又產生了師夷長技的近代文化。在目

睹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之後，魏源在國內最早喊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在此觀念的指導下，他介紹引進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科學技術、軍工製造、歷史地理、社會制度等等。對當時的中國而言，這些均是最新的近代文化成果。魏源等人倡言「師夷長技」，而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羅澤南、郭嵩燾等人則是以自己的社會政治活動實踐「師夷長技」。這批湘軍頭領最早在國內創辦近代軍事工業、近代學校、向外派遣留學生。因此，他們也就成為中國近代化運動的第一個階段——洋務運動的領袖人物。從魏源到曾國藩，代表了嶽麓書院學生在求新中實現著向近代文化的轉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嶽麓書院不僅在文物古蹟上得以修復，而且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的功能陸續恢復，呈現出重振的勢頭。今天，嶽麓書院基本上恢復了歷史上辦學最盛時期的建築規制，書院講學、藏書和祭祀的基本格局已獲重現，並已建成中國書院博物館。現在，嶽麓書院已經成為歷史學的博士後流動站，並獲得歷史學一級學科的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授予權；哲學門類的中國哲學碩士、博士學位授予權，每年為國家培養國學方面的高層次研究型人才。

經過多年的積累和發展，目前嶽麓書院已經在宋明理學史、經學史、諸子學、書院制度、近現代社會思潮與變遷、文物考古等領域形成特色，並在國內學界具有一定地位，詳敘如下：

一、理學研究：宋明理學是嶽麓書院的學術傳統，也是今天的重點研究方向。朱漢民教授、姜廣輝教授、陳谷嘉教授、蕭永明教授、章啟輝教授多年從事宋明理學研究，已經出版了《宋明理學通論》、《玄學與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理學與中國文化》、《宋代《四書》學與理學》、《湖湘學派史論》、《宋代理學倫理學思想》、《元代理學倫理學思想》、《北宋新學與理學》、《中國學術史（宋元卷）》、《曠世大儒——朱熹》、《曠世大儒——王夫之》等多種學術專著，這些在學術上有諸多創新的著作受到學界的關注和讚譽。其中，朱漢民教授的理學研究是從分析中國傳統思想的特點開始的。他認為中國傳統思想包括經驗—技藝、理性—知識、超越—信仰三個層面，在儒家文化這裏可以分別表述為儒術、儒學、儒道。他將宋明理學解構為宋明儒者對人文信仰（道）的重建、經學知識（學）的開拓、生活實踐（治術與心術）的回歸三個層面。他努力用這一新的學術理念去解讀宋明理學，將宋明理學史的演變發展與道、學、術的思想結構聯繫起來。這些觀點集中表現在《宋明理學通論》一書中。朱漢民教授、蕭永明教授在

《宋代《四書》學與理學》一書中，系統地研究、論述了《四書》學的淵源及在兩宋時期的演變與發展，探討了宋代《四書》學與理學思潮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繫，並對濂學、關學、洛學、荊公新學、蜀學、湖湘學、象山學在《四書》學的詮釋與理學建構方面的學術特色與思想創新，作了較為系統的闡述，尤其是對朱熹理學思想與《四書》學之間的互動關係，作了頗為深入的探討。他們著重從經典詮釋學的角度，闡發了朱熹《四書》學的詮釋方法、學術成就與思想貢獻，並從儒家的人文信仰、實踐工夫的角度，探討了朱熹《四書》學的學術成就與思想特色，試圖通過上述分析，揭示儒家思想及其知識形態的歷史特質與文化特色。

另外，理學與其他學術形態之間的關係，也成為嶽麓書院理學研究的一大特色。朱漢民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魏晉玄學與宋明理學學術理路研究」，運用了內在理路、譜系學、比較哲學的方法，一方面從「人格理想—身心之學—性理之學」的架構，肯定了玄學與理學之間的思想理路；另一方面，又從經典詮釋學的角度，通過玄學與理學對《論語》、《周易》的詮釋，分析與證實玄學與理學之間的學術脈絡。這樣將玄學與理學兩大思潮貫通起來進行研究，拓寬了理學研究的思路。蕭永明教授的《北宋新學與理學》採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對北宋中期同時興起而又相互對立的荊公新學與理學這兩大學派，進行較為系統的研究。章啟輝教授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專案《清代理學研究》，則將理學研究進一步深化，並延伸到清代，並試圖探討清代理學與樸學之間的關係。

二、經學史研究：嶽麓書院也以中國經學史為主要研究方向。姜廣輝教授主編的《中國經學思想史》是一項歷時八年，最終成果為四卷五冊約三百萬字的著作。《中國經學思想史》與傳統意義的經學史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即傳統經學史偏重講經學的傳承脈絡，而忽略傳承者對經學所把握的意義。而此書則著重討論了傳統經學的價值與意義問題，表達了關於傳統經學的新認識。此書的出版引發了學術界關於中國哲學與傳統經學關係的一些新思考。近年來，姜先生談到中國哲學史、思想史與中國經學史的關係時說：「檢討和反思八十年來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狀況，我們得到這樣一種認識：以往的中國經學史（或思想史）缺少『根』，即經學，而以往的中國經學史又缺少『魂』，即價值和意義，因此要想寫一部有『根』的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須先寫一部有『魂』的中國經學思想史。」目前，姜教授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中國經學史》的研究，注重儒家經典的文本分析和傳承，已邀請國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十三位經學研究專家致力於十三經簡史的

撰寫。

陳戍國教授曾受業於「當今治《禮經》之第一人」沈文倬先生，為中國大陸第一位專攻禮制的博士。經過多年的積累與沉澱，陳戍國先生以一人之力，遍注群經，先後出版了《四書校注》、《五經校注》等著作。在嶽麓書社出版的〈四書五經校注本總序〉中，他談到治古代學術（包括經學）與學術史（包括經學史）的七條心得：（一）自東周到清朝，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核心只能是經學，只能是解說、研究《易》、《書》、《詩》、《禮》、《樂》、《春秋》六經（漢以後附加《論語》、《孝經》與小學，宋以後加上《孟子》的經學）。（二）人文社會科學所有領域，經學幾乎沒有不涉及的。（三）六經（後來《樂經》亡佚，已是五而不六）對於中國社會科學都很重要，可是六經之間並非平列關係，六經總以《禮》為本。（四）經、史、子、集之學都應該學，都應該治。原因在於：一則史、子、集部之學自身重要，其內容與作用非經學所能取代；二則史、子、集部文獻或者可以證明《五經》文字，或者可以證明經學道理。（五）作為儒學中心的經學不必排斥佛道二氏之學。（六）南宋以後興起的「《四書》學」，固然是傳統經學發展的重要產物，已經在經學史裏占有重要位置，但它畢竟只是經學的一個重要部分而已。（七）經學沒有死，經學不會死。

陳戍國先生自博士畢業後，窮十五年之力，閱八百餘部圖書，完成並出版六卷本兩百七十餘萬字的中國第一部古代禮制通史《中國禮制史》，堪稱本領域的開拓之作，該書納入國家新聞出版署「十五」規劃重點圖書，榮獲湖南省第七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吳龍輝教授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研究，著有《原始儒家考述》、《孔子言行錄》、《墨子白話今譯》等；主編有《中華雜經集成》、《藝術生活小品古籍叢刊》、《古詩文精品錄》等；發表論文有〈說「老子」〉、〈〈九歌〉源於黃河流域考〉、〈〈天問〉為歷史教材說〉、〈「儒分為八」別解〉等。在近代經學史領域，吳仰湘教授承擔了國家清史課題《皮錫瑞全集》的整理與研究工作，目前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新學偽經』說的淵源、形成與回應研究」，同時還主持「皮錫瑞與近代今文經學」等多項省級課題，出版了學術專著《皮錫瑞生平和思想研究》，是國內外知名的皮錫瑞研究專家。龔抗雲教授是國家新聞出版署「十五」規劃重點圖書《十三經注疏》的實際主編，主持整理《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發表論文十餘篇。古籍整理《十三經注疏》獲第五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第三屆全國古籍整理圖書獎一等獎。以上研究

工作和成果，使嶽麓書院在經學史研究領域處於國內領先地位。

三、諸子學研究：嶽麓書院也十分重視諸子學研究。張松輝教授在道家道教與文學研究及儒、釋、道比較研究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已撰《老子研究》、《莊子考辨》、《《論語》、《孟子》疑義研究》、《先秦兩漢道家與文學》、《漢魏六朝道教與文學》、《唐宋道家道教與文學》、《元明清道教與文學》、《儒釋道與文人》、《十世紀前的湖南宗教》九部學術專著，出版《老子譯注》、《新譯沖虛至德真經》、《新譯莊子》、《新譯無能子》、《新譯坐忘論》、《新譯妙法蓮華經》、《新譯杜牧詩文集》七部譯著。發表〈重評老子的「小國寡民」思想〉、〈談道家對先秦楚辭的影響〉、〈老子的循環論是正確理論〉等學術論文一百餘篇，其中多篇被《人民日報（海外版）》、《新華文摘》、《文摘報》、《人大複印資料》等刊物摘登或全文轉載。錢永生副教授在墨學研究領域卓有建樹。他從社會史和文化史入手，研究墨學思想及其體系的生成與演變，提出墨學集合核心論，改變了考察墨子思想體系的角度和方法，並對諸子之學的研究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近幾年來發表相關論文十篇，論著《墨子思想結構的生成》等。目前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墨學史」的研究。胡遂教授長期從事佛教思想史研究，在佛教與文人研究及佛教與唐代文學研究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學術研究特色。近五年來，胡遂教授先後主持國家級課題「佛教與中國文人心路歷程」一項、省級課題一項，出版專著《中國佛教與文學》、《佛教禪宗與唐代詩風之發展演變》二部，發表論文二十餘篇。李清良教授致力於中西闡釋思想比較研究，已發表學術論文三十餘篇，出版個人專著三種：《中國闡釋學》、《熊十力、陳寅恪、錢鍾書闡釋思想研究》、《中國文論思辨思維》，在現代新儒家及其闡釋思想的研究上多有創獲，目前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現代新儒家的本體論探索與『中國現代性』設計研究」。

四、書院研究：建設一個為學界所公認的書院研究中心、資料中心和藏品展示中心，是嶽麓書院多年來的目標之一。鄧洪波教授長期從事中國書院研究，其研究集中在制度、歷史、教育三個方面，並開始涉及日本、韓國書院，將視野擴大到東亞文化圈，先後出版國家新聞出版署重點圖書《中國書院史資料》（全三冊）、《中國書院制度研究》，出版《中國書院史》、《長江流域的書院》以及《中國狀元殿試卷大全》（全二冊）等。目前主持全國教育科學「十五」規劃重點課題「中國書院教育制度研究」、香港孔安道紀念基金課題「中國書院規章集成與研究」。

其中，《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是近幾年來中國古代教育制度和書院制度研究的標誌性成果，先後榮獲湖南省第五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第三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蕭永明教授多年來致力於從文化社會史的角度研究書院，在書院與儒學傳播與地方文化的互動關係上，形成了鮮明的研究特色，其研究多獲國家社科基金、省部級社科基金及教育規劃專案資助。其論文〈書院與地方社會的互動〉、〈唐宋之際的社會文化環境與書院的興起〉、〈從書院看地方文化主導權的爭奪〉、〈書院的發展對地區文化地理格局的影響〉、〈歷代地方官員支持書院發展的動機探析〉、〈家族力量對書院發展的推動及其動機〉等多被《新華文摘》、人大複印資料等全文收錄，有力地推動了國內的書院文化研究。李兵教授關注書院與科舉制度的關係，專著《書院與科舉制度研究》得到兩岸學者的推許。目前正在主持全國教育科學規劃「十五」課題「書院與科舉互動關係研究」、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課題「書院與學術學派研究」等。

五、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思潮研究：近年來，書院也開拓了中國近現代社會改革及歷史變遷、社會政治思想方面的研究。陳先初教授參與了國家社科重點課題「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的研究，並主持「中國近現代憲政思潮研究」等多項省級課題，出版了《程潛與近代中國》、《日軍侵湘暴行研究》、《中國近代社會思潮》（四卷本，分卷主編）、《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合著）、《精神自由與民族復興：張君勱思想綜論》、《孫中山民權主義探微》等著作，較為系統地闡述了近代湖南以及近代中國社會歷史變遷的源流，並就梁啟超、張君勱、胡適、孫中山、陳獨秀、毛澤東等多位近現代重要人物以及五四、新民主主義、中間路線等文化、政治思潮進行了專題研究。陳先初教授還首次整理出版了《易白沙集》，為相關研究搭建了完整的資料平臺。丁平一教授的《湖南維新運動史》、《湖湘文化傳統與湖南維新運動》，則集中探討了維新時期湖南社會的政治、文化變動，其和朱漢民教授共同主持的國家清史課題《湘軍》，進一步深化了近代史研究。楊代春副教授著力於近現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其湖南省社科課題「萬國公報與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系列論文及同名專著，在該領域研究中處於前列。

六、長江流域古文明與出土簡帛文獻研究：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以來，隨著長江流域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長江流域文明」的概念在中國乃至世界考古文物研究和歷史文化研究領域中得以確定，從而有力推動了中國歷史文化區域性研究的深入，並使得歷史文化研究有形與無形層面間的斷層得以填充，並有機結合。嶽麓書

院的文物考古研究也著力於此。向桃初研究員在長江流域考古，尤其在商、周、楚系青銅器研究方面成績斐然。他曾獨立主持多項國家考古發掘專案，其中寧鄉縣炭河里商周遺址的發掘榮獲「二〇〇四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獎。現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課題一項，其專著《湘江流域商周青銅文化研究》一書在學界獲得一致好評。他長期從事南方商周考古和青銅文明的研究，發表相關論文二十餘篇。其中對於湖南出土商周青銅器的研究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較大影響。胡彬彬教授目前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長江流域宗教文化研究」，曾主持「中國竹藝術史」、「湖湘木雕藝術研究」、「湖湘壁畫藝術研究」等國家與省社科基金課題，著有《寶慶竹刻》、《湖西南木雕》等，有三十餘篇論文在海內外公開發表。

陳松長研究員從事出土簡帛文獻，特別是馬王堆帛書研究多年，在這一領域成果顯著，曾應邀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系主講馬王堆帛書研究課程，並曾以《中國簡牘集成（湖南卷）》的主編主持湖南出土簡牘的整理編撰。近幾年來，陳松長研究員出版簡帛整理研究的著作四部，有二十餘篇論文分別在《文史》、《文物》、《簡帛研究》、《簡帛》、《出土文獻研究》等學術刊物上發表。其著作《馬王堆簡帛文字編》、《馬王堆帛書〈刑德〉研究論稿》、《簡帛研究文稿》等，對馬王堆帛書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許道勝研究員以楚地出土楚簡文獻、楚文物為主要研究對象，利用這些資料探索楚史源流及楚文化的特質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他參加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專案「戰國楚簡綜合整理與研究」子課題《望山楚簡》的整理與研究，目前正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曾國文字整理與研究」。他還結合楚地出土器物研究楚文化，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並有專著《流光溢彩——楚國的漆器竹簡玉器絲綢》出版。

于振波教授利用簡牘、金石等資料與傳世文獻相結合，應用社會學、計量史學等理論和方法研究秦漢三國基層社會，主持並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簡牘與秦漢社會」，出版專著有《秦漢法律與社會》、《走馬樓吳簡初探》、《走馬樓吳簡續探》和譯著《漢代行政記錄》。目前，于振波教授正在主持教育部社科基金專案「走馬樓吳簡與孫吳基層社會」和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專案「秦漢三國戶籍制度研究」等，致力於全面研究秦漢三國基層社會制度沿革與社會變遷。二〇〇八年，嶽麓書院從海外搶救回購一批秦簡。二〇〇九年陳松長研究員和許道勝研究員分別獲得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資助，使嶽麓書院藏秦簡研究進一步深化。今年召開的「嶽麓書院秦簡國際學術討論會」，這一研究課題正受到考古學

界的普遍關注。

總之，嶽麓書院當今的學術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多元化研究趨勢：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書院，它始終將中國思想與學術作為主要的研究方向，並承擔著探索儒學能否轉型與現代化的文化使命；作為現代大學的一個文科院系，它在努力探索傳統書院教育制度與現代大學教育制度之間的有機融合；作為一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它在文物保護和教學、考古研究與發現上，正進行著卓有成效的探索。我們注視著嶽麓書院學術的發展，也期待著在中西文化進一步交融的今天，它能夠在學術思想上，實現新的創新與超越。